

文艺评论

注重主意 自出机杼

——司玉笙小小说简论

□ 杨晓敏

无形中已是中华母亲的象征。

黄河故道曾从豫东商丘缓缓流过，庄子故里，地灵人杰。司玉笙的小小说得益于厚重文化的积淀，语言简洁朴素，文字凝练清丽，构思奇妙，汇集起来坚实无比。新时期的中国小小说，如果以传统与现代、故事性与思想性区分，司玉笙无疑是当代小小说领域中的佼佼者。40年来，他在小小说写作中独出机杼，把作品的深刻立意视为小说的命根子，在思想境界、生活深度和艺术高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

司玉笙在新疆长大，当过农场知青、教师，后来当兵退伍后回到老家商丘。大漠风尘，军营历练，都会是人生成长的高质营养，他骨子里透出的那种豪气和正义感，自然从他的小说作品中反映出来。1983年的小小说创作领域，司玉笙的《书法家》或许可以称得上最具“开拓”意味的作品，作家以189个字，经典地诠释了小小说文体萌芽期就坚守的“微言大义”特征。诙谐超然的笔调，言简意赅的文风，蕴含了作家深邃的思想与聚焦能力，仅此一篇，曾让作者一夜成名。

书法比赛会上，人们围住前来观看的高局长，请他留步。“写什么呢？”高局长笑眯眯地提起笔，歪着头问。“写什么都行，就写局长最得心应手的字吧。”“那我就献丑了。”高局长沉吟片刻，轻抖手腕落下笔去，立刻，两个劲秀的大字就从笔端跳到宣纸上：“同意”。

人群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有人大声嚷道：“请再写几个。”

高局长循声望去，面露难色地说：“不写了——能写好的就这两个字……”

这篇作品精练至极，通过一个人物、一个场景、一个细节、一个疑问，在拨乱反正、催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同意”这两个字振聋发聩的功效在于，它不动声色地揭示了一个巨大的发现。体制弊端、官僚作风以及干群关系、盲从心理，在这不足200字的显影之下无处可遁，直至体无完肤。它一经发表很快风靡全国，流传海外。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在今天看来，这类针砭时弊的小品文学似乎显得简单化了，但在上世纪80年代，却是要有极大的生活勇气和概括力才能写得出来。

我以为，如果追本溯源，当代小小说创作有三种写法，可谓冰峰泉眼，居功甚伟。许行的《立正》注重故事人物的起承转合，文学性强，是经典的传统小小说写法；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举重若轻，言有尽而意悠远，是经典的以柔克刚的思辨哲理小小说写法；司玉笙的《书法家》雕塑般简洁，立意高远，是经典的一剑封喉的小小说写法。三种风格，三种流派，均能自成一派，影响深远，构成了最早在文体上跨越了小小说局限的范例，后来被誉为当代小小说三类主要写法的开山之作。如今30多年过去了，重温《书法家》所携带的忧患意识、现实意义和文本价值，不难发现它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高等教育》通过高考落榜生成长为职业经理人的过程，提取出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社会转型之际，作家对商品时代价值重构、中西文化融合等重大问题的深层思考。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在一些人精神危机崩溃、价值观彷徨迷失之时，及时释放出“商道即人道”的时代思考，表现了一个作家一贯勇于站在时代前沿思索的勇气，并通过主人公的言行，坚定表达了对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强烈自信，读来发人深思，令人感奋。

在人物塑造上，《高等教育》中的强和强的母亲没有一笔肖像描写，文字叙述如行云流水一般为读者开启了情绪的律动。面对一份心仪的工作，求职者除了文凭、技能之外，自然有素质取胜一说。“强说，我家很穷，父母不识字。可他们对我的教育是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含辛茹苦供我上大学。她说俺不指望你高人一等，你能做好自个儿的事就中。”文贵朴实，最注重真情流露。作者精心塑造的主人公强，是商品时代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一个代表，而强的母亲虽然没有出场，但

在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司玉笙的小小说创作，注重人物精神面貌的描绘，所塑造的人物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唤起人们对社会现状加以思考和重视。其小说情节和细节的安排有感情色彩，可以看出构思的匠心。《高等教育》可以看出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仍是他的强项：善于在特定环境（特别是逆境）中突出人物坚韧不拔的个性。创作态度严谨而真挚，从他的代表作可以看出，他热情地赞扬那种无私、忘我、忍辱负重的性格，肯定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司玉笙说：小说，无论长短，“都是一个娘的孩子”，有高低，有胖有瘦，有的粗壮一些，有的精巧一些。不能说这孩子胖就有出息，也不能说这孩子瘦就没有成色。古今中外，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都是一些短文。文字不在多少，而是在于有没有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是思想和发现，就是对人生、自然和时代的认知。这种作品的生命力远远超过作者本身，而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所以说，好作品会永久地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滋润着人们的心灵。

《长命嫁妆》的创作，体现了对比和衬托两种相似的修辞手法。在文学创作中为了突出人物的不同个性和命运，或者厘清事情的主次关系，以深化主题，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让人们在比较中进行有效鉴别，比如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的差异，即使同一类别，也因“好花还要绿叶扶持”，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启示。《长命嫁妆》采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塑造了从旧时代过来的大奶奶和二奶奶的不同人物性格，为人处世形似而神异，命运大相径庭，读来饶有趣味。

身为妯娌，大奶奶和二奶奶从嫁入婆家的那一天，就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大奶奶心高气傲，处处都想争先，在风头上压过二奶奶；二奶奶则谦虚和善，孝奉公婆，相夫教子，做纯粹的贤妻良母。大奶奶为物欲所控，求得药方后在门口支起药摊，明码标价，给村人治病却所获无几，村人见她绕道躲着走；二奶奶凭一副石臼，一个铜盆，一把压舌板，无偿为百姓诊治，村人尊称她为“小脚二奶奶”；强悍的大奶奶活到七十多岁即撒手而去，二奶奶活到110岁还健在。动机之差毫厘，结果谬之千里。

中国有句古语：“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其中，以德传家，最为长久，以财传家，最靠不住。作品正面描写的是大奶奶和二奶奶两位主人公为人处世的大相异趣，也从侧面反映了两位主人公的家风家教之不同：大奶奶嫁来时高高发髻上插着亮晃晃的银钗，刻意炫耀富人攀比、看重物欲；二奶奶只带着郎中世家传给她的三样美德：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修德积善！也就文题中所道的“长命嫁妆”，而这份“长命嫁妆”，不仅增寿，而且传承良好家风。

再回到作品的表现手法上，把两妯娌放在给人看病的同一件事情上，进行比照和呼应，充分揭示出本质性的差异。子女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可以照见她们父母留给子女的不同嫁妆，直接影响了女儿整个一生。给予孙留下家财万贯，不如留下好家风的传承。《长命嫁妆》给读者上了生动一课。

司玉笙的创作是丰富多彩的，他的创作与时代密不可分，无一不透露出作者的本色情怀，在小小说创作上的贡献和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他坚守小小说的主体意识和精品意识，故有“芝麻虽小，榨香油非它不可”“比作品本身更大的思想”这样简明精深的论断。他认为在创作中要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发现，用心灵去捕捉。只有对周围“小人物”的情感、欲望和生活状态深入了解，才能感同身受，因而写出的作品才会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染力。当今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家。小小说写作者成为伟大作家的前提是，让你的小小说内涵大起来。

子不教，父之过，知其子者莫若父，还有望子成龙等，这些老话讲的都是关于家教家风的事儿。《孝心》中的父亲大半辈子在黄河故道上种粮扒食、栽藕捞鱼，一身尘土两腿泥，终于盼到儿子大学毕业，在县政府工作，几

年后当上了科级干部，又结婚生子，分了不小的住房。儿大不由爹娘，何况还是个“凤凰男”，又远离爹娘。然而“大”从儿子的言谈举止中还是感觉到一些变化，为了把育儿经验到底，在儿子当了副县长回家探亲时，又进行了一次“重现家史”式的言传身教，以防微杜渐。

“大”一是纠正儿子的叫法，不能叫“妈”，还是要叫“娘”，不仅仅是入乡随俗，而是无论走到哪里，即便是多么出人头地，都不能忘了“从哪里来”，别忘了你是谁！“大”二是坐上板车，让儿子拉着，车后还拴了只羊，去找东地摘豆角儿的娘。这一幕，儿子“看到这辆车板都开了缝的旧物，他就想起了上大学前的那些日日夜夜——就是靠这辆车，父母风里来雨里去，顶起了家里的一片天。视线里，父亲苍老的背影和那些岁月留下的画面叠合在一起；“大”不止一次坐过这车，他也不止一次用这车拉过“大！”故事的结尾也是升华，“大”其实要的孝心一句话道破：“小儿，百姓是父母，你把百姓的事办好，就是对大和娘的最大孝敬！”

评论家卧虎认为：司玉笙的小小说创作说明，小篇幅，大容量应是小小说的一条大道，小小说同样可以反映大世界，只要能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善于结构和开拓就会行行无疆。无论何种文体，都是以精神容量为最高计算单位的。唐诗、宋词在形式上小于长篇小说、小小说，子弹、原子弹在体积上都小于长矛和大炮，但我们能说它们小吗？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在一个档次上吗？因此，小小说作家们都应有一种源于高度的自信与追求，那种为表象迷惑，只把小小说看作是一种快餐文化的误读者，应该有所醒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老年群体，他们孤独而居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关注热点。《第二把钥匙》中的男主人公丧妻独居，因女儿一家外出旅游要去照顾女儿家的猫，无意中走错小区进错了门，却在那扇门里遇上了另一位独居的老妇人。老妇人胸怀军旅情节，热衷于收集军功章、奖状、奖杯。这让她与同样当过军人的男主人公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故事没有详细讲述两位老人的交往，却在字里行间蕴含着甜蜜温暖之意。七天后，男主人公女儿一家旅游回来，发现自家的猫饿瘦了，父亲原来根本没有到家里来过，见面后发现老人的手里多了另一把洪大姐家的钥匙。

《第二把钥匙》以钥匙为道具，设悬念，埋伏笔，巧妙构思，讲述了两为老年人有着共同的志趣爱好而抱团取暖的故事。语言朴素而诙谐，给“空巢老人”这一话题带来暖意与亮色。这个道具运用巧妙，一语双关，既是现实中开启房门的钥匙，也是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儿女们可以给老人胸前拴上一把开房门的钥匙，却无法给他们一把开启心灵之门的钥匙。由此说来，小小说文字虽少，同样能反映大问题。

司玉笙1990年参加过“汤泉池全国小小说笔会”，是业界公认的以质取胜的代表作家之一，迄今已著有小说集《巴拉拉之犬》《沉在水底的房间》《未拆的好书》等多部。他多年来坚持笔耕不辍，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甚至进入语文课本和改编为影视小品。他曾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在报纸副刊上对小小说情有独钟，不断推荐和推介周围的小小说写作者，营造出一种地域性的作家群体，勾勒出一方文化风景。闲暇之余，又和文友们进入小店郊野聚会，几个小菜，满桌酒香，依次坐定，谈诗论文，多有收获，执着于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构筑精神家园。

2013年，司玉笙以参评作品《蝴蝶庄之秤》《寻犬》《红哥》《孝心》《孙子》《最亮的灯》《夜礼》《烂账》《净手》等10篇，成为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得者，其授奖词为：司玉笙笔下的小小说人物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他透过特定的生活场景和小小说人物的历史故事，将小小说立意或者向现代的反腐主题去发挥和引申，或者向人性深层的善恶美丑等内涵去开掘，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哲理感。高质量的小小说作品，一旦携带有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特征后，仍然可以机智地与政治生活的大主题、与人性意识的深刻内涵建立起密切的艺术联系。

古宋颀英

唐代晚期诗人韦庄游览芒砀山写了一首诗《登汉高庙闲眺》：“独寻仙境上高原，云雨深藏古帝坛。天畔晚峰青簇簇，槛前春树碧团团。参差郭外楼台小，断续风中鼓角残。一带远光何处水，钓舟闲系夕阳滩。”这首诗不但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中的每一句诗，都涉及到芒砀山的古迹，分别写了古帝坛（汉高庙）、城墙、楼台、碣泽，使我们看到唐代碣城（保安镇）的风貌。

“仙境”说明芒砀山一带的风光秀丽，湖光山色，青山绿水，群峰如簇，白云缭绕，如同仙境。“上高原”指韦庄登上芒砀山。“云雨”形容山巅之高，能够上接云气。“深藏”说明山上植被茂密，林木高大葳蕤，“古帝坛”就藏在这树林里。不登上山巅，是看不到的帝坛的。所谓“古”是指汉代，“帝”是指汉高祖刘邦，“坛”是指祭坛即祭祀的庙宇，也就是汉高庙。

韦庄登上芒砀山主峰，寻找到了传说中的汉高庙旧址。但韦庄没有说到“帝坛”究竟是什么模样，但从下一句诗“槛前春树碧团团”来看，汉高庙并没有毁弃，“槛”是窗槛，韦庄从汉高庙的窗槛朝外眺望，说明汉高庙还矗立着。根据《史记》记载，汉高庙始修于西汉汉惠帝时期，至唐代晚期已过去了千余年，如果不维修一定废弃了。韦庄登上汉高庙，窗槛还存在，说明在唐代汉高庙得到了维修。这个汉高庙并非现在在古银杏树的位置，史籍记载古银杏处在唐代为王官寺。由此我们知道在唐代汉高庙位于芒砀山主峰，其实就是今天芒砀山主峰的汉代礼仪建筑基址。

芒砀山中的碣城，最迟在秦朝就已经置县，西安相家巷秦宫遗址发现的“碣丞之印”封泥是碣县存在的证明。碣县既已存在，城墙作为配套工程也很有可能存在。汉代碣县地位非常重要，西汉和东汉400多年期间，一直是梁国隶属的县城和陵邑。芒砀山是兵家必争之地，碣城山环水绕、易守难攻，唐依时而修筑的城墙是碣城的一道重要防护屏障。

在唐代的时候碣城已经不是县城，而是设置保安镇，但是当时城墙还在。唐代诗文里有碣城城墙的记载。当时韦庄在山上汉高庙上朝下鸟瞰，看到山下的城城外有楼台，而且参差不齐，显得小。

根据地形分析，韦庄看到的城墙应该是碣城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城墙，但东城墙外有河道，西城墙外有湖泊，诗人看到的南北城墙外的楼台，这个楼台既有可能是保安镇外的建筑，也有可能是南城城外保安山北坡山脚下的建筑。韦庄的诗是目前发现的首次提到碣城城墙的唐诗，通过其诗文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晚期芒山镇的部分风貌。

《登汉高庙闲眺》中写到了芒砀山的碣泽，这是目前唯一发现的写碣泽的唐诗。碣泽最早记载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在大泽之畔斩蛇。西汉刘向《列仙传》记载的更详细一些，有涓子、石柱在碣泽中成仙，又有琴高成仙，“琴高一琴高者，以鼓琴为业，为宋康王舍人，行彭、涓之术，浮游碣泽间二百余年，后入碣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曰：皆洁斋侍于水旁，设屋祠，果乘赤鲤鱼出，入坐祠中，碣中有可万人观之，留月余，复入水也。”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由古籍记载可知，碣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有名气。北魏时代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来芒砀山游览，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写到了碣城和碣泽的情况，“山有梁孝王祠，获水又东，谷水注之，水上呈碣破，破中有香城，城在四水之中，乘诸破散流，以零水、澧水、清水也，积而成潭，谓之碣水。”此碣水即碣泽，也就是碣湖，湖泊在碣山脚下，以山命名，具体位置在今新砦碑南面、西面和西南一带。

韦庄在《登汉高庙闲眺》中最后写到：“一带远光何处水，钓舟闲系夕阳滩。”作者是站在芒砀山主峰上看到山下的景象，“一带远光”是指哪里呢？从作者前面的诗文来看，诗人是向南眺望的，因此“一带远光何处水”应是指南面的碣泽，能够形成“远光”，必然有规模比较大的水体或烟波浩渺的水面，在芒砀山主峰的南面只有碣泽湖符合“远光”的视角效果。“钓舟闲系夕阳滩”描写了碣泽湖边在夕阳映照下有钓鱼之船拴系在河滩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碣泽湖山水相依，水草丰美，锦鳞游弋，秦汉时期的原生态还保留着。

骑行商丘 之三十三

荒原迢递起高台

□ 文/图书者

永城市西约25公里酈城镇政府南侧有处高台，古时称酈台。相传西汉丞相萧何曾在此制订汉律，故名造律台。

从永城老城顺着311国道一路向西骑行就到了酈城镇。造律台位于两片河水之后，一条简易马路直通正门。路上原有一座拱桥，老砖砌成。年久失修，砖桥已废弃，路边泥土填堰，两侧河流遂不能相通。远远望见，大门牌坊上书“西汉造律台”5个大字，雄浑苍茫，是著名书法家陈天然题写的。

两扇红漆大门紧锁，路边人家，恰是义务看守人郭老师。见有人参观，郭老师慌忙拿着钥匙打开门锁，用力推开门，进入院里，院子里有座萧何祠。不过郭老师并没有走进祠堂，而是给看了两座石碑。第一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3月5日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律台遗址”，河南省人民政府立的石碑；第二座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律台遗址”，永城市人民政府2008年2月立的石碑。看过这两块石碑，缓步走近高台，高台上的草从里躺着一块有些残破的石碑。郭老师指着残碑很是惋惜地说，这才是最早立在这儿的石碑。挥掉尘土，石碑上依稀刻有“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造律台遗址，河南省人民委员会1963年6月立”的字样，算算都快60年了。怪不得郭老师很看重它，不知道这块石碑该不该保护！

眼前的造律台为一椭圆形高台，形如龟背。台身杂树丛生，且处处有浅壕从下一直延伸到台上。此时正值夏天，造律台笼罩在青葱树木之中。登上台上，放眼四望，方觉台之高阔。造律台北边有个水塘，塘里的水清见底，不时有鲤鱼跃出水面。郭老师说，酈城老城有大小坑塘七八处，相传因筑建老城墙古城墙和造律台所需大量土方所致。造律台遗址原来高达数十丈，站在造律台上可以看见远处的芒砀山。现存遗址高度7米，南北长50米，东西宽35米，面积1750平方米。因处于古秦汉县城内，故四周遍布秦汉瓦砾。由于几千年来风雨侵蚀以及人为的破坏，遗址西、南两侧已成陡壁，将文化层及其中包含物、灰坑等暴露



出来。造律台遗址发掘于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曾作过试掘，其探沟在遗址南端上部清晰可见。该遗址文化层较厚，上层为商代遗存，下层为龙山文化堆积，东、西两侧断壁上可见灰坑、房基残壁断面等。出土遗物有石斧、石刀、蚌镰、石箭头、骨锥以及大量的陶片、蚌壳。陶片以夹砂灰陶为主，泥砂灰陶次之，绳纹、方格纹居多，兼有篮纹和附加堆纹陶片，还见有黑色蛋壳陶片。造律台遗址出土的遗物与石岗、王湾出土的龙山期遗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陶、石、骨、蚌等器皿都表现出龙山文化的特征。因此，该遗址应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1963年6月，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定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造律台，亦称酈台，“酈台晴晓”为永城

古代八景之一。唐代大诗人李白携友到此游览，他在《忆旧游寄酈郡元参军》一诗中写道：“渭桥南头一遇君，酈台之北又离群。”台前有萧何祠，我们进祠内，仅见萧何塑像一尊，徒有四壁。萧相国面容有些迟滞，也许是终日操劳国事所致。萧相国遗留后世的遗迹似乎不多，这和他一向低调为人、明哲保身有关。

其实，萧何者，汉初三杰之一也，汉高祖刘邦的同乡，秦末辅佐刘邦，“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帮助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因功被封为酈侯。后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九章律》，颁行天下。传说造律台就是萧何编撰汉律的地方。

萧何造律是由史料依据的。《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意思是萧何是沛丰人，通晓律

令，执法公平，没有别人能比得上，所以被任命为沛县的主吏掾。说明他是熟悉秦朝法律的人。又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意思是沛公进入咸阳，将领们都争先奔向储藏金帛财物的仓库去分东西，唯独萧何先去把秦朝丞相和御史大夫保管的法律诏令以及各种图书文献收藏起来。说明他是善于收集法律文本的人。再载，“何谨守管箠，因民之萧疾秦法，顺与流之更始。”意思是说萧何谨慎地守护关中这一根本重地，民众痛恨秦朝严刑苛法，顺应时代的潮流，与百姓们一起更新政治。说明他是在秦法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法律的人。

关于造律台还有一个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西汉初年，酈城里有一位邱生，家贫才高，享誉乡邻。当时朝廷尚未开科选贤，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邱生就去投靠在京为相的老

乡萧何。萧何见邱生谈吐不凡、文章锦绣满篇，震惊不已。遂由嫉生怒，不予举荐，还将邱生的文章付之一炬，致使邱生报国无门。邱生含恨返乡，立志写律，惩恶扬善，地点就选在绿水环绕、清静幽邃、高可数丈的酈台。其妻貌美贤惠，日日送饭，寒来暑往，《律典》上下两卷终将写成。这日，妻子提着饭篮，跨过小桥，见路边桃子又大又鲜，便随手摘了几个放进篮子里，以示庆贺。不想触犯了刚写好的律条“妇人盗窃，当笞”，邱生含泪把妻子休回娘家。邱生母亲知道了，气愤地责问邱生“休妻不兼母，该当何罪？”邱生愣住了，“休妻不兼母，死罪。”邱生祭祭律书，临死前交代母亲，把《律典》上卷拿到京城去卖，下卷留给。母亲把邱生埋葬在造律台上，便按儿子的遗嘱，沿途乞讨，直奔京城。再说萧何，一日朝毕，回府的路上见一个乡间老嫗卖一本《律典》，拨开围观的人群，拿起《律典》，看了几页，惊叹不已，许5000两银子买下《律典》，并带邱母一同回府。萧何细阅《律典》，知有下卷。邱母说《律典》下卷已与儿子陪葬，再高的价钱也不能掘墓卖书。萧何为求得全律书，便差人连夜前往酈城，挖墓盗书，将《律典》全册呈现刘邦。刘邦连翻数章，喜不自胜，忽发现最后一款：“私盗律书，当斩。”刘邦为了《律典》的实施，只得忍痛杀了萧何。从此，“邱生造律萧何死，不斩萧何律不全”的故事就流传下来。郭老师说，当地人讲起来有趣的多了。不论老少，不管今古，每个人都能像评书似的说上一段，就像讲述自己的故事。邱生的造律台，成为一个古老历史走来的当地人的精神图腾。

一个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人们相信传说，不论史实如何。仿佛历史能篡改，而传说永远不可更改。更改了，整个区域的历史就索然无味，如残垣断壁，满目狼藉。一座不起眼的土丘矗立了四千年。厚重的泥土、沧桑的瓦片依稀述说着它的悠远和声名。是的，这就是酈城造律台。沧海桑田，赞扬、贬斥、繁华、萧索，胜利者的欢声笑语，失败者的呻吟哭泣，早已被时代的飓风吹散，只留下一堆荒凉的高台和一个悲情的传说。